

洪湛侯 撰

文
獻
學

藝文印書館印行

G 256
20063.2

洪湛侯 撰

文
獻
學

藝文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再版一刷

文獻學

精裝全一冊 編號：四三一六

定價 新台幣 八八〇元整（外埠酌加郵紮費）

著作者 洪湛侯

出版發行 藝文印書館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五三號四樓之三

郵政劃撥 000—96010

電話 02—2362—6012

傳真 02—2366—0977

E-MAIL yeewen@ms9.hinet.net

印刷者 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20-112-4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發給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三一四號

再版自序

近得藝文印書館通知，一九九六年版《文獻學》即將再版，聞訊之下，不勝喜悅。一部著作，經過長時期的廣泛流傳，特別是在社會經濟轉型期學術著作出版不甚景氣的今天，能夠適應研究需要、受到讀者歡迎、從而出現再版需求，應該說是很難得的現象。這對於作者、對於讀者、特別是對於主持編印出版、經營運作的印書館，都將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在兩岸經貿往來、學術交往越來越受到重視的形勢下，編印這類古文獻學著作，對於宏揚祖國傳統文化，促進兩岸學術交流，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這次再版，本可趁此作些增刪修訂，但因考慮到原書創立了「體」「法」「史」「論」分編立論的體制，各編圍繞著中國傳統文獻展開論列，共同構成一個互相關聯比較完整的有機體，因此每一章節的改動，很有可能涉及其他篇章的內容，稍不經意，就會出現前後抵牾、顧此失彼的弊端，因此原書的修訂，必須在有充分時間、充足資料的前提下，高屋建瓴，全面著眼，方才可望修改得當，有所收獲。目前我手邊尚有兩部書稿，正待結尾付印，時間精力都感到不足，這次《文獻學》再版，祇能按原書重印，不作重大改動，只是在原書第四編第三章《中國文獻學家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建樹》一章中，增補數家，藉以照顧到文獻學史上各個時段的代表性。如是而已。值茲付印之前，謹將有關情況，告知讀者。是為序。

自序

中國文獻起源極早，而成爲專門之學則較遲，又多被泛稱爲「國學」或「校讎學」，至以「文獻學」爲專門學科者，晚近始有所聞。當代以「文獻學」名書行世者亦僅數家，惟所論皆文獻整理之方法，且僅及目錄、版本、校勘三端，難免滋人疑惑。蓋以我國文獻學歷史源遠流長，內容博大精深，範圍寬廣多門，豈目錄、版本、校勘三者所能盡括？爰不揣譎陋，撰成《中國文獻學的重要課題——兼論建立中國文獻學的完整體系》一文（載《杭州大學學報》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發表以後，叠接各方讀者來函，鼓勵編寫專書以暢其說。勗勉有加，期望殷切，爲是撰成此稿，分形體、方法、歷史、理論四編立目，作拋磚之試。書中所述，漏略殊多，誠欲然不敢自信者也。尚祈海內外碩彥專家，不吝匡正，歧予望之。是爲序。

洪湛侯 一九九三年九月于杭州大學中文系

緒論

我國的古典文獻有著極為悠久的歷史，對這些文獻進行研究和整理，從而形成的一門學問，就是文獻學。我國文獻產生很早，而文獻學一詞的出現却比較遲，這是因為先秦時期的文獻研究，本來就在萌芽階段；漢代以來，從事研究和整理文獻的工作實踐，或者被稱作「校讎」，或者被稱作「國學研究」，「整理國故」等等，從來沒有得到正名，文獻學的名詞近代才出現，它既不同於歷史上「經學」「樸學」，也不同於「考古學」「語言文學」，它的確切涵義，還正在被人們逐步認識和論定之中。

「文獻」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八佾》篇，鄭玄和朱熹解釋「文」為「文章」，「獻」為「賢才」或「賢」。元代馬端臨作《文獻通考》，取「文獻」二字作為書名，自序謂：「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末以來諸臣之奏議、諸儒之議論謂之「獻」。」馬端臨稍後，元代的大詩人楊維禎《送僧歸日本》詩：「我欲東夷訪文獻，歸來中土校全經」，所指的「文獻」似乎已專指書籍資料了。明代編纂《永樂大典》，開始曾稱作《文獻大成》；稍後，程敏政作《新安文獻志》；清代錢林輯《文獻徵存錄》，都把「文獻」作為書籍資料的代稱。

當代學者對「文獻」的看法也還不太一致，有的認為「文獻」包括書本的記載和耆舊的言論，這是傳統的看法；有的把「文獻」看作「古籍」的同義語，認為「文獻」就是「古籍」，這看法也未為盡當，雖然「文獻」主要內容是「古籍」，但它還包含了「古籍」以外的甲骨文、金文、簡牘、碑拓、文書、檔案、信札、契約、手稿等各種形式的「文獻」，把「文獻」局限於「古籍」，是縮小了「文獻」的含義。

「文獻」必須具有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但決不是凡具有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的東西都是「文獻」。例如地下掘出的古物，遠古人類的骨骼，沒有文字的陶器、銅器、漆器，以及古代的遺址、模型、造像、繪畫等等，這些實物，雖然有歷史價值，有的是歷史文物，但它們是古器物學、古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屬於考古範疇，與「文獻」有別。《辭源》給「文獻」下的定義是：「指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辭海》略同。按「文物」指的是歷代遺留下來的、在文化發展史上有價值的東西，諸如建築、雕刻、繪畫、圖書、陶器等等，古籍中部分精刻本固然有文物價值，但一般古籍却稱不上文物，把「文獻」釋作「圖書文物」則是擴大了「文獻」的範圍。

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當代有些情報工作者認為「情報」就是「文獻」。但是，情報は動態性的、活的，有較強的針對性，它不局限於文字，也可以用符號記錄，還有實物情報，如採取實物呈列、語言交流等方式，它不局限於以往和現時的材料，還能預測將來，有反饋作用。這些特點，與用文字記載的靜止的圖書資料，迥然有別。情報就是文獻的說法，更是不能成立的。

時至今日，由於文獻的內容、形式以及記錄文獻的載體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又有人主張把「文獻」區分為「現代文獻」與「古典文獻」，但不論如何，總應當有一個兩者可以相通的定義。我想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凡是用文字寫成的，具有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的圖書資料，就是「文獻」。

文獻學的含義怎樣？迄今為止，國內辭書還沒有設立「文獻學」這一詞目。《中文大辭典》雖然立了詞目，釋文却很含糊：「研究一民族之語言文學，以了解其文明程度之學術，謂之文獻學」，它撇開歷史文獻不談，把「文獻學」局限在「研究一民族之語言文學」，其疏略失當，蓋已毋容置辨。文獻學本是關於文獻研究和整理的一門學問，文獻本身的特點、文獻整理的方法、文獻學的歷史、文獻學的理论都應包括在內，簡單地說，文獻學應包括文獻的體、法、史、論等幾方面的內容，並把這些融為一體，進行系統研究，逐步建立文獻學的完整體系。

當前幾部「文獻學」專書，都側重於講授文獻整理方法，業師欣夫先生《文獻學講義》特設一章，名曰：「文獻學的三個內容」，並闡述說：「既稱為「文獻學」就必須名副其實，至少要掌握怎樣來認識、運用、處理、接受文獻的方法……本課定為三個內容：一、目錄、二、版本、三、校讎。」認為「文獻學」只是講授文獻整理方法的，這種觀點，現在還有一定的代表性，認為「文獻學」無非是文字、音韻、訓詁加上版本、目錄、校勘而已。文字、音韻、訓詁屬「古代漢語」範圍，因而文獻學只須講版本、目錄、校勘就可以了。這種看法，恐怕是不夠全面的。

從現在高等院校開設的課程看，中國文學專業一般開設有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文學概論、文藝

批評與寫作等；歷史專業開設有中國歷史、史學史、史學概論、考古學通論等。上述這些課程的設置，都考慮到各個專業的特點、研究方法、歷史和理論。就是中醫院校開設課程也還注意到中醫傳統的「理、法、方、藥」完整體系。惟獨文獻專業的「中國文獻學」却只講文獻整理方法，只講整理方法中的部分內容，豈非以偏概全，名不副實！現在，全國先後設立了許多所古籍研究所或文獻管理部門，在大學裡開設了文獻專業，一些有條件的高等學校，先後開始招收古典文獻方面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毫無疑問，「中國文獻學」業已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而不僅僅是一門課程。當前面對教學改革的大好形勢，深盼能對文獻專業的課程設置，作出一些相應改革：建議按照「文獻學」的體、法、史、論四方面的內容，試設「書籍（檔案）制度史」「文獻整理方法論」「中國文獻學史」「中國文獻學理論」等專業基礎課；同時，結合文獻整理方法，開設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編纂等專修或選修課；結合文獻學的相關學科，開設「古代漢語」「考古學」「圖書學」「中國古代文化史」等課程。如有條件，還可以開設「古籍整理」「文史工具書」「古代文化知識」「史料學通論」「古代典章制度」等專題課。此外，加強課外實習，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則又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使學生將來走上工作崗位，能夠學以致用，成為文獻部門真正能挑重擔的新生力量，不致高分低能，紙上談兵。下面再就文獻學的體、法、史、論四個部分，談一些粗淺認識，作為引玉之磚。

(一) 體

凡文獻形體之特點皆屬之。

1. 文獻的載體 就是記錄文獻的材料，如現代所用的紙、膠片、磁帶等都是，而在紙和雕版印刷發明之前，我國人民早就利用甲骨、金石、簡牘、縑帛來刻寫紀事，這些記錄文獻的載體，起著保存、傳播和發展文化的作用。甲骨、竹木簡和帛書都是近代、當代才陸續出土的，甲骨文在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才被發現，至一九八四年統計，八十五年總共發現甲骨約十五萬片左右，其中包括流散海外十二個國家收藏的甲骨二六七〇〇片（根據一九八四年七月胡厚宣《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統計》一文）。對於甲骨文的研究，現在已經成爲一門專門學問，甲骨文可釋的字約一千個以上。關於青銅器上的文字，商代銘文比較簡單，西周銘文最繁，至春秋時又趨於簡要，已發現的傳世和出土的青銅器總數約在一萬件以上，其中帶有銘文的銅器據嚴一萍先生所撰《金文總集》蒐錄八〇二三器（銘圖全錄），發現商周金文單字約共三五〇〇個，其中可釋字約二〇〇〇個。古代發現竹、木簡牘見於記載的已有過多次，原物早已蕩然無存。近世自清光緒二十五年新疆塔里木河出土晉代木簡，到民國三十八年五十年間，發現竹木簡並見於報導的共有七次，民國三年發現的敦煌漢簡、民國十九年發現居延漢簡、羅布淖爾漢簡，影響都比較大。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先後在湖北、湖南、河南、山東、江蘇、江西、甘肅、新疆等地發現竹木簡三十批，約共四萬枚，其中時代較早的是湖南長沙、河南信陽、湖北江陵出土的戰國楚簡，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書簡。雖然歷史記載春秋時期已用簡書，但迄今爲止，還沒有發現。春秋戰國時期，帛書也已經相當流行，因此古代文獻

常有「竹帛」並提的記載，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帛畫的同時，還出土了六百多枚竹簡，這說明在紙張發明以前，多是簡帛同用。只是縑帛埋藏在地下容易腐朽，所以現代考古工作中出土的竹簡比較多，發現的帛書却比較少，因而我們對帛書的知識也比較缺乏，民國三十一年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楚帛書（又稱《晚周繒書》）早已流散國外，一九七三年馬王堆漢墓出土了二十多種十二萬多字的西漢帛書，才豐富了我們對縑帛的認識。

「著於竹帛謂之書」，簡冊和帛書，在漢代是書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紙張發明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縑帛仍然在繼續使用，東漢以後，紙張才漸漸代替了縑帛，成為常用的書寫材料。

我們從甲骨、金石、竹簡、縑帛、紙這些文獻載體發展變化的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文字形體和書籍制度的起源和演變。商周銘文的字體，一般稱為大篆，秦漢時期轉向小篆和隸書，戰國楚簡的文字，上承商周甲骨文、金文，下啟秦篆和隸書，是文字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具有獨特風格。出土的漢簡，則多為隸書，如武威漢《儀禮》簡，共存二萬七千四百餘字，較之熹平石經殘存八千數百字，多了將近二萬個字，而且都是真正漢代通行的隸書，可見這些記錄文獻的載體，也是研究我國文字源流演變的重要材料。這些簡牘，同時也是考核書籍制度的實物。竹簡編聯成冊，收卷起來，要用最後一枚簡作軸，從尾部往前反卷，第一枚簡的背面在外邊，加上篇題，便成爲一卷書的形式，等到發明了紙，轉移成爲卷軸的紙本，再發展爲宋代各種形式的裝本，或多或少還保存著古代簡牘制度和書史的重要依據。我國現存的古籍，就是從這些記錄文字的材料發展而來的。這些材料的本身還不

是古書，甲骨文是古人占卜後刻上去的卜辭，青銅器上的文字，多數是王公貴族紀功頌德的銘文，殷周時期竹木簡上的文字多數是紀事。這些，不論它的內容如何，當時都還沒有編成書，都只能算作文獻或檔案，直到經過孔子和戰國時學者的整理，編成經傳，才可以稱得上是「書」。現在有些論述古典文獻的著作，把所有古代記錄文獻的材料，渾稱之曰「書」，有的著作，甚至還說什麼「龜甲獸骨的書」、「青銅的書」、「竹木的書」、「縑帛的書」、「石頭的書」，並總稱之為「雕版印刷發明前的古籍圖書」，（引例見《中國古籍印刷史》。）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們要研究古代文獻的載體，還有更重要的一層意思，就是這些載體材料本身的價值，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儀禮》簡，山東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簡，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老子》帛書，都是考古史上的驚人發現，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和科研價值，利用這些文字材料，補史、考史、校史、證史，其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2. 文獻的體裁 古代流傳至今的文獻資料，從編纂形式區分，大致可以分為匯編、專著、總集、別集、辭書、類書、政書、叢書、長編、約編、方志、表譜、圖錄、碑帖、信札、檔案等十多種體裁，細分當不止此，這裡不過粗略地舉其常見常用者而已，文獻工作者應把這些看作文獻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來熟悉它，研究它。熟悉它的內容特點，便於閱讀使用；研究它的編纂結構，便於推陳出新。這些文獻體裁，就其中任何一門深入研究，都是專家之學。宋代鄭樵之重視圖譜，清代章學誠之論述方志，當代胡道靜對類書的研究，張滌華對類書和總集的評述，都已卓然名家。

在文獻研究工作上，有些傳統看法，有時也給研究工作帶來一定的影響。例如總集的起源問題，歷來都認為先有別集，後有總集，別集之名起於東漢，總集起源於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其書已佚，現存總集，以《文選》為第一部。其實，總集之起，應該上溯《詩》《騷》，可是，自漢代以來，《詩》被列為「六藝」之一，成了儒家的經典；《楚辭》又被後代目錄家列為獨立的類目——「楚辭類」，都不算作總集。相沿至今，積重難返，現在應該循名責實，把這些因襲未當的分類，糾正過來，還其本來面目。聯想到余嘉錫先生疑西京之末，已有別集，並認為「秦漢諸子，即後世之文集」（見《古書通例》卷二），這都是實事求是評論文獻體裁的卓越見解，對我們很有教益和啟迪。

3. 文獻的體例 文獻中的古書，特別是先秦時期的古書，其體例與後世不盡相同，試舉三例，述之於下：

(1) 古書多無書名。古書的命名，多出於後人的追題。上古無私學，古時的官書，或舉著書之意以為名，或舉所記之事以為名，前者如古書《連山》《歸藏》《乘》《樛杌》《春秋》等，後者如《六藝略》中之《司馬法》《國語》《世本》《戰國策》等都是。還有一些古書，常摘首句以題篇（本節所論，多採余嘉錫先生之說），王國維說：「《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書名之通例，字書亦然。」（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五）還有一些古書，原無書名，後世乃以人名為書名。如《史記·韓非傳》云：「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這裡只列篇名，並無書名，後世乃名之為《韓非子》。至於自撰書名，當始於呂不韋的《呂氏

《春秋》和淮南王安的《鴻烈》，直至東漢以後，除了別集，皆有書名。

(2) 古書不題作者。《易繫辭傳》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世耶？」其辭疑而未定，並未題爲文王所作。這種情況，直到秦漢還是如此。《史記·韓非傳》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可見非經李斯提出，秦王尚不知其書爲韓非所作。《司馬相如傳》云：「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相如，相如曰：「有是。」——這些，都是古人著書不自著姓名的確證。

周秦之書，既不著姓氏，門弟子相與編錄，又有所增益，數傳之後，不辨其出於何人手筆，則推本先師，於篇目之下題曰某子，於是，後人以爲某子即作者的姓名。這些著述，雖云學有師法，書則多非出於一手，這是不可不知的。

(3) 古書有單篇別行之例。這也有幾種情況，一爲本是單篇，後人收入總集，其後又從總集內析出單行，如漢人從《尚書》中析出《禹貢》《洪範》，宋人從《禮記》中析出《曲禮》《檀弓》，單篇獨行。另一種情況是，本是單行之篇，收入全書以後，原來單行之本，還並存不廢。余嘉錫先生曾評論「章學誠不知此義，其《校讎通義》乃謂《弟子職》《三朝記》爲劉歆「裁篇別出」，若先有《管子》《大戴禮》而後有《弟子職》《三朝記》者，不免顛倒事實矣。」（見《古書通例》卷三）原

來《弟子職》《三朝記》早已在《管子》《戴記》之先，就已作單篇別行，正像後代先有單行之本，後有叢書一樣。

從事文獻整理而不明古書之體例，欲論古書之真偽，無異緣木求魚。所以說，不明古書之體例，難以讀古人之書，論古人之文。故文獻辨「體」，至關重要，不可不三致意焉。

(二) 法

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編纂六者，都是文獻整理的重要方法，再輔以標點、注釋、翻譯、資料搜集、文獻保藏等方面的知識和方法，就構成了文獻學方法論的完整內容。目錄、版本、校勘三者，各類專著，論述已多，不再重述，述辨偽、輯佚、編纂之重要性如下：

1. 辨偽 辨偽是文獻整理、史料鑒別的基礎工作，就書本文獻來說，辨偽的任務，包括對古籍名稱、作者、年代、版刻真偽的考訂，也包括對古籍內容、史實、學說真偽的考辨。具體地說，前者主要是辨別偽書，與文獻學關係更加密切，後者主要是辨別偽說，屬於學術思想史的研究範圍。古典文獻學研究以古籍為主要對象，辨別偽書應是文獻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提，當然，也會涉及書籍內容的真偽問題，與辨偽說不能截然分開，只是在具體問題上各有側重而已。

我國的古籍，習慣上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各類之中都出現過不少偽書，據明代辨偽學家胡應麟分析，「凡四部之偽者，子為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偽書的產生有多方面的原因，總的來說，先秦時期有意造作偽書的比較少，秦漢以後，蓄意作偽的漸多，到了明代中葉，製造

偽書發展到十分嚴重的地步。歷史上從目錄學角度考辨偽書的，首推西漢時期的劉向，人們稱道的劉向校書就包括辨偽的內容在內。張舜徽先生研究《漢書·藝文志》，總結出劉向考辨偽書的六條義例，對文獻學研究啟迪良多。唐代劉知幾、啖助，柳宗元、韓愈；宋代歐陽修、朱熹、葉適、高似孫；元代吳澄；明代宋濂、梅賾、胡應麟；清代姚際恒、閻若璩、崔述這些文獻學大家，對辨偽工作都作出過很大貢獻，這是文獻學史上值得奮筆大書的。辨偽之重要如此，怎麼不能列入文獻整理方法之列呢！

2. 輯佚 我國的古典文獻，散佚的現象非常嚴重。這些散佚的材料往往在同時的其他文字中，保存著片斷，後人把這些殘篇斷句，一點一滴的鉤稽出來，或使原書恢復舊觀，或使其文略存梗概，或補其佚篇，或訂其訛誤，對於文獻整理來說，輯佚的功用是不可低估的。

據文獻記載，漢、唐學者已做過不少輯佚工作，南宋時期就出現了完整的輯本，清代從《永樂大典》輯出並已錄入《四庫全書》的，就有三百八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之多，嘉慶時期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宋會要》五、六百卷，這些，在學術研究上，都是很有價值的。清代敕編《全唐詩》《全唐文》《全金詩》以及張金吾輯《金文最》，李調元輯《全五代詩》、特別是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都採用輯佚方法，搜集遺文，這些大型的詩文總集，都是文獻整理和輯佚的重要成果，對後世影響很大。到了現代，輯佚工作已由經學附庸、考據學支流發展成爲科學研究、文獻整理的重要手段。魯迅所輯《古小說鈎沉》《會稽郡故書雜集》，輯佚的對象亦已由輯經

說，輯子、史、詩文集擴大到輯小說、戲曲、詞、詩話、語言、方志、敦煌遺書、科技文獻等方面，並已先後產生了一大批質量較高的輯佚成果。輯佚的作用如此巨大，又怎麼不能列入文獻整理方法之列呢？

3. 編纂 古典文獻之所以能夠匯集成書，能夠流傳至今，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便是「編纂」。《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冊」，金文「冊」字，就很像竹簡的編綴形式，「典」字則像置「冊」於几上。竹簡的編綴成「冊」，對後來書籍的編纂，有很大的啟發作用。「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見龔自珍《六經正名》）「《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見章學誠《校讎通義》）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他在文化史上最大的貢獻就是整理、編纂，編訂《六經》。漢代劉向、劉歆校理群書，所做的重要工作，諸如條其篇目，刪其複重，定著篇名，也都屬於編纂之事。劉向《晏子書錄》云「又有複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複列以為一篇。」說明他對於編次是非常謹慎的。《戰國策書錄》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國策》記各國的史事，其中本無次序，劉向在校讎時，為考其時代而重加編次，然後一國之史事，秩然有序。可見劉向早已把編纂作為整理文獻的重要方法，付諸實用了。古典文獻的重要體裁，如辭書、類書、詩文總集、叢書、政書、方志、圖譜、檔案史料等等，無一不是採用編纂方法，類輯資料，編訂而成。這些體裁，大都屬於後世所謂「資料書」「工具書」一類，它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章學誠說：「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察之功」，他認為「比次之